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zhongguosanwenshichangbian

中国散文史长编

上册



郭预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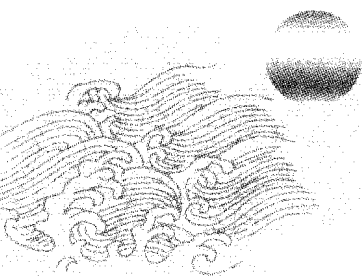
中國散文史長編

zhongguosanwenshichangbian 上冊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教育出版社



目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先 秦

第一章 概论	17
第二章 巫卜之文	31
第一节 卜辞、卦爻辞	32
第二节 《易传》	36
第三章 史家之文	41
第一节 钟鼎彝器之铭	42
第二节 虞夏商周之书	44
第三节 春秋战国之史	49
一 《春秋》	50
二 《国语》	53
三 《左传》	58
四 《战国策》	66
第四章 诸子之文	72
第一节 儒家之文	74
一 《论语》	74
二 《孟子》	79
三 《荀子》	85
第二节 墨家之文	90

第三节 道家之文	95
一 《老子》	95
二 《庄子》	101
第四节 法家之文	107
第五节 杂家之文	113

第二编 秦 汉

第一章 概论	119
第二章 赋体之文	130
第一节 歌颂之文	131
一 李斯	131
二 司马相如	133
三 扬雄	135
四 班固	137
第二节 牢骚之文	139
一 东方朔	139
二 扬雄	140
第三章 史传之文	143
第一节 司马迁的《史记》	144
一 “史家之绝唱”	146
二 “无韵之《离骚》”	150
第二节 班固的《汉书》	163
一 《汉书》异于《史记》的文章	164
二 《汉书》同于《史记》的文章	165
三 《汉书》文章的新特点	168
第四章 论说之文	173
第一节 汉初学杂申商之文	176
一 贾谊	176
二 晁错	179
第二节 前汉尊儒杂霸之文	182
一 董仲舒	182
二 淮南王刘安	184
第三节 两汉之际学风复古之文	187

一 扬雄	187
二 王充	190
第四节 汉末揭露时弊之文	194
一 王符	194
二 仲长统	196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

第一章 概论	203
第二章 魏晋之文	214
第一节 汉魏之际	214
一 曹氏父子	214
二 建安诸子	224
第二节 魏晋之际	230
一 何晏、王弼	230
二 阮籍、嵇康	236
第三节 两晋、晋宋之际	245
一 陆机	245
二 刘琨	248
三 王羲之	251
四 陶渊明	255
第三章 南朝之文	261
第一节 “庸主”之文	261
一 梁武帝萧衍	261
二 简文帝萧纲	266
第二节 “词臣”之文	268
一 沈约	268
二 任昉	272
第三节 世家之文	275
一 王筠	275
二 刘孝绰	277
第四节 寒门之文	279
一 鲍照	279
二 刘峻	282

第四章 北朝之文	286
第一节 由南入北之文	286
一 庾信	286
二 颜之推	288
第二节 北方征实之文	292
一 郦道元	292
二 杨衒之	295

第四编 隋唐五代

第一章 概论	303
第二章 隋世之文	313
第一节 卢思道之歌颂新朝	314
第二节 王通之提倡复古	316
第三章 贞观前后之文	322
第一节 直言极谏之文	322
第二节 牢骚愤世之文	325
一 王绩	325
二 王勃	326
第四章 武周治下之文	330
第一节 御用学士之文	330
第二节 指陈时弊之文	333
第五章 开元年间之文	336
第一节 盛世之文	336
第二节 忧世之文	338
第六章 “安史之乱”前后之文	341
第一节 衰世之文	341
一 萧颖士	341
二 元结	344
第二节 乱世之文	350
一 梁肃	350
二 陆贽	352
第七章 永贞前后之文（一）	356

第一节 韩愈	356
第二节 李翱、皇甫湜	367
一 李翱	367
二 皇甫湜	371
第八章 永贞前后之文 (二)	375
第一节 柳宗元	375
第二节 刘禹锡	387
第九章 会昌前后之文	392
第一节 白居易	392
第二节 杜牧	397
第三节 李德裕	401
第十章 唐末五代之文	406
第一节 孙樵	406
第二节 皮日休	412
第三节 罗隐	415

绪 论

中国历代散文，也如诗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从先秦开始，直到晚清，每个时期的散文，都有其时代的特色。

但历代散文浩如烟海，只见一斑，难窥全豹。为了使读者有个总体的认识，这里拟对各个时期散文的特点作个简要的介绍，并对散文发展的历史作些概括的说明。

从殷商开始，中国散文有了相当完整的形态，其特点是发言直率，用语质朴，不尚雕饰，而粗具文采，有所形容，而并非刻意。例如《盘庚》三篇，记载盘庚迁都的告谕，其中有“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云云，话是说得相当直率的，用先王和天命作为发号施令的依据，反映了殷人敬事天地鬼神的思想特点。从艺术形式看，行文虽然旨在说理，用语却已颇具形象。引譬设喻，粗具先秦散文的艺术特征。例如说：“若颠木之有由蘖”，“若网在纲”，“若农夫服田力穡”，“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等等，都不仅是抽象地说理，而颇富于形象性。

当然，这些文章写定之时，已在西周或更晚的春秋战国之世。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有所加工和润色，未必仍是本来的面目。但从文章总的内容和形式看，仍然不失殷商文章粗率质直的特点，与后人的拟古之作如《虞书》的《尧典》、《舜典》，或《夏书》的《甘誓》，以及《商书》的《汤誓》、《汤诰》等等有所不同。

到了西周，散文的特点有了变化。《尚书》里的几篇《周书》已与《商书》的《盘庚》显然不同。以周公告诫成王的《无逸》而论，内容虽然也讲“天命”，也称“先王”，但更多的是讲人事，讲“保民”多于“敬天”，特别是讲到以殷为鉴，已经重视历史经验。例如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如此等等，多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教。这是西周的几篇诰命之文的主要特点。这样的思想内容，已与殷商之文有所不同。由于旨在说教，吐辞用语，也有新的特征：语气比较平和，吐辞比较委婉；引证历史故事，亦多娓娓可听。孔子曾用“郁郁乎

文哉”称赞周之文化，就散文而言，也有这个特点。

到了春秋之世，文章的特点又有变化。这时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私人可以讲学，处士可以横议。于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说理之文和史传之文。《周易》一书，“人更三代，世历三古”，但写定之时，亦在晚期。其中《易传》之作，虽未必出自孔子，但成文之日，可能已是春秋之末或战国之初。例如其中的《系辞》上、中、下三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春秋战国的文风特点。上篇讲到天地变化，人事吉凶，有这样的话：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样的文章，是殷商、西周所不曾有的。

《系辞》不仅讲历史经验，而且讲处世哲学，例如下篇说：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这里从安危治乱，讲到安身保国。有经验谈，有辩证法，是人生哲学，也是处世之道；是人事，也是政治。

《系辞》是《易传》诸篇的代表，代表着这个时期哲理之文的新特征。

《系辞》之外，《文言》一篇也是一向为人称道的作品。清人阮元在《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说：“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他特别称道其中“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艺术特征。阮元将《易传》之文仍然视为孔子所作，自是未脱传统之见，但他发现“奇偶相生”这些特点，则是看出了这类文章的时代特征。

当春秋战国之际，各体文章，韵散不分，骈散不分。当时的诗歌可以无韵，而散文却可用韵。这种体式，颇与后代不同。

代表这个时期文章特点的，还有《论语》、《国语》和《左传》。

《论语》一书，乃孔门师徒的对话之文。这个形式也是新体。师徒之间坐而论道，与《尚书》中君臣之间咨询政事不同。其内容之广阔，形式之自由，开了后代讲学之文的先河。其中只言片语，往往包含深邃的哲理。例如《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云：“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语虽简短，而意味深长。另外，还有一些时事短评、文艺短论，也都写得精练简要。还有一些论学之言，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先进》篇的《侍坐》一章，不仅是坐而论道，而且是专题论政。这样的文章也是前此诸书所不曾有的。

《国语》和《左传》代表这个时期的史传之文。二书相传都是左丘明所著，其实都是托名。这样的著作，既非成于一时，也非出自一手。二书内容有相同之处，文风也有近似之处，但《国语》偏重讲述片段的史实，旨在说教；而《左传》则

在编述系统的史事，偏重纪实。例如《国语·鲁语上》中“晋人杀厉公”一段，讲到国君被杀，咎由自取，过在厉公，不在晋人。这同《周语上》的“厉王虐”一段文章的命意相似，都是从历史故事中引出教训。由于旨在说教，所以行文也就婉而多讽。

《左传》记事又侧重于记载行人的言论和战争的过程。记言记事都比《国语》更为完密、生动。从思想内容看，《左传》在讲天、神、君、民的关系方面，和《国语》相似，且比《国语》更倾向民意。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三年”写子产不毁乡校，重视舆论，尊重民意，与《国语》中“邵公谏弭谤”的话大体一致。“桓公三年”还有“夫民，神之主也”的话，以民为主，比《国语》更为明确。

《左传》记事之工，可以“隐公元年”所记《郑伯克段于鄢》一篇文字为例。在这篇记事中，以极简练的笔墨，记述了纷繁的事件，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层次之分明，语言之精练，结构之严密，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左传》记言之美，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所载行人的辞令，委婉曲折，极有特征。例如写子产于襄公二十五年伐陈而献捷于晋，晋人之问，子产之答，最后竟使晋卿士庄伯无话可说。孔子为此曾发表评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言而有文，可以说是《左传》记言的一大特征。唐人刘知几《史通·申左》说：“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又在《载言》篇说：《左传》之文，能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时至战国，文章的变化更大。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所谓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虽不尽确当，但战国之时，社会有更大的变革，文章有更大的变化，战国之文，承前启后，对后代有更大影响，则是事实。

这时文章之所以有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诸子驰说，百家争鸣，著书立说，都放言无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墨、道、法和纵横家。

儒家之文，在战国时期，主要著作是《孟子》和《荀子》。孟轲和荀卿都是孔门后学。孟轲道性善，而荀卿讲性恶；孟轲称先王，而荀卿法后王。《孟子》之文，引譬设喻，纵横博辩；《荀子》之文，立论驳论，章法谨严。孟子发展了孔门的仁政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这在《孟子见梁襄王》一则文章里便有所体现。他对于梁襄王这样的诸侯之王，竟谓“望之不似人君”。他在王公面前，能够无所畏惧，如此放肆，形于文章，也就气势充沛。荀卿虽亦出自孔门后学，但他的思想却突破了儒家的某些观念。尤其在天人关系方面，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天论》一篇就与儒家的传统思想不同。他的文章，吐辞用语也更为精密。《劝学》一篇，引物连类，反复论证，颇有学者之文的特征。

墨家之文的代表著作是《墨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大主张，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对于墨家的这种思想，孟轲攻击不遗余力，指为“无父无君”。荀卿也认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但庄子则以为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乃

天下之“才士”。从《兼爱》、《非攻》、《节用》、《节葬》以及《非乐》等篇看来，墨子对于王公大人之责难，多半是从万民百姓之利出发的。这在诸子百家中，是很突出的。但墨家过于尚质而不重文，因此，发而为文，虽讲“三表”之法，逻辑严谨，却缺乏文采，与儒者之尚文有所不同。

道家之文的代表著作是《老子》和《庄子》。老聃其人的生活时代也许早于战国，但其书之成，已在春秋战国之际。老聃、庄周，都讲无为，但老子旨在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归于一切不为。二者的思想和文风有同有异。“时有愤辞”，为二书所同。而《庄子》文章之汪洋恣肆，不但超过《老子》，而且超过晚周诸子。《齐物论》中几段文字，形象之生动，设想之奇瑰，皆非诸子百家之文所能及。其涉世之文，如“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云云，也比《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云云更为深刻痛快。

后代与《庄子》并称的著作还有《列子》。此书或谓晋人伪托，然书中实有先秦的原始文字，其中有些寓言故事如“杞人忧天”之类，都非后人所能伪造，文章也瑰丽不凡，很有文采。

法家的代表著作是《韩非子》。韩非著书，已是战国晚期。韩非文章的思想特点也很突出，一是崭新的历史观点，一是全面的法治理论。其《五蠹》一篇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论证刑赏之必要的。他说远古的天子享受甚薄，故肯于辞位；而当今的县令享受极厚，故不肯去职。从物质实利立论，不用道德观念说教，这是早期地主阶级思想家坦率真实的文字。这样的文章是很有时代特点的。

最能代表战国时代特点的文章，还有《战国策》。此书一般视为历史著作，谓之史传之文。其实，从其思想倾向观察，实为纵横家言。书中记录了大量纵横家的言论和活动，当然也包括了战国时期各国纷争的历史。纵横家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其观念更明显地突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文章也比各家各派更加放言无惮。宋人李文叔在《书〈战国策〉后》中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譎诘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美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文辞之胜”，确是《战国策》一书的一大特点。

当然，《战国策》一书的内容又是驳杂的。其中也不尽是纵横家言，例如《齐策四》颜斅论贵士一段，就包含了道家思想。这段文章的风格也和苏秦、张仪等人的游说之辞有所不同。

战国晚期，九流十家之中，还有杂家一派，其代表著作是《吕氏春秋》。此书特点是“合儒墨，兼名法”，不名一家之学，反映了战国后期各家各派互相融合的一种倾向。此书的结构比前此诸书更成体系，文章也写得比较平实。《去私》一篇，对于现实政治有所批判，行文也敢于放言。虽然是在秦相吕不韦指令之下产生的著述，却仍有战国时期的文风特点。

秦并六国，天下一统，时代发生了大的变动。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推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专制的政策，这对文章的影响甚大。《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这同当时的政策颇有关系。终秦之世，号为作者的，只有丞相李斯。李斯的传统名篇《谏逐客书》写于秦并天下之前，文章还比较畅所欲言，仍有战国之文

的特点。在这以后，他又写过几篇刻石之文，都是颂德纪功，和前代之文便迥然不同了。

楚汉之际，杂学复兴，游学之士，多慕纵横；汉初法网又比较疏阔，于是汉初之文，又延续了若干战国的余风。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书》，出谋献策，虽已不同于战国的策士之辞，而驰骋辞辩，仍似曾受管、商、纵横的影响。

但到了武帝之世，情况不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风变化，文风亦变。从董仲舒开始，改变了战国的余风。但司马迁生当武帝之世，所著《史记》，却仍然具有先秦的文风特点。这是因为司马迁看到了许多历史上的不公，故发而为文，多所不平。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指出了这个特征。

在司马迁以后，经生博士之文，几乎无足道者。在西汉统治的二百年间，值得称道的作者，还有早期的东方朔，所写《答客难》一文，很有特色。到了东汉，最可称道的作者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更是出类拔萃，大不同于经生、博士的文章。还有仲长统的《昌言》，对于汉末的现实，多所批判，《理乱》一文，颇有新的时代特点。

这时反映世风、士风的文章，还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一类作品。由于汉代后期法令滋繁，豪侠之士，不免犯禁。故此时此际，颇多“诫子”、“教子”之文。这类文章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

汉魏之际，天下大乱，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儒术开始动摇，名法思想、宗教思想开始流行。加以这时曹操当权，下过几篇“求贤”的命令，公然倡言“唯才是举”。他自己能写文章，又网罗了许多文士，在他的影响之下，文章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与曹操同时，还有孔融，文章也写得很有新的特征。他写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胆大气盛。他另有《论祢衡书》和《论盛孝章书》，也写得“气扬采飞”（《文心雕龙·章表》）。“气扬采飞”，也可以说通脱、随便。这是孔融文章的一大特点。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其他诸子之文，也都写得比较通脱、随便。但孔融虽在“七子”之列，而年辈较长，其行文之以气，又非其他诸子所及。

到了魏晋之际，文章的代表作者有阮籍和嵇康。《文心雕龙》称此二人“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当时司马氏当权，提倡儒学，宣扬礼教，嵇、阮二人都反对这种伪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触犯了当时的统治思想的。他还有另外几篇作品如《管蔡论》等，都是鲁迅所谓“思想新颖”的文章。

到了两晋，文风与魏晋之际又有不同。这时的诗文作者号称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但就散文而言，更值得称道的作者是王羲之。此人文名一向为书名所掩，其实他的文章是很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他的名篇《兰亭集序》，虽为宴集而作，但不同于寻常的应酬文字，写得极有情致。其中说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颇与刘琨的《答卢湛书》所谓“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

同调。文章表面平淡，而内心并不平和。如果联系到他的《诫谢万书》、《誓墓文》诸作，对于这篇文章更可获得深入一层的理解。

到了晋宋之际，文章的代表作者是陶潜。他的文章表面看去更加平淡。《五柳先生传》自叙生平，真似忘怀得失、遗落世事者。此外，《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也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在他另外的一些诗文里，也有愤激和不平。“平淡”，只是他的文风的一个方面。

到了南朝，改朝换代比过去频繁，士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很大。三教并行，人无特操。在宋、齐、梁、陈几代，出现了几个“文雅的庸主”和一批“柔媚的词臣”。这时的文章变化也大。“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几位很有特色的作者，写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文章。

早期的鲍照，以诗见称，但他的散文也很突出。他的一篇《请假启》和另一篇《瓜步山楬文》，篇章甚小，而意蕴甚深，对于当时的世态人情，揭露得相当别致。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都是传统的名篇，可以看做当时骈体文章的代表作品。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则更是集南朝骈文之大成者。

齐梁时期，还产生了一些书札小品，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都写得清新秀丽，模山范水，前此罕见。

这个时期，在众多的“无特操”的作者中，也有坚持特操的，如范缜之撰《神灭论》，就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名文。

这时的北朝之文，又与南朝不同。如酈道元撰《水经注》，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行文虽受南朝的影响，但叙事重视征实，则是北方文风的特点。

颜之推由南入北，所撰《颜氏家训》，也是独具特色的著作，作者自称他的“家世文章”与梁世的时文有所不同。

到了隋唐，天下又归一统。下逮两宋，发生了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几百年间，文章又有新的演变。

唐代初年，政治比较开明，虽然天下一统，而太宗为政，却不同于秦皇汉武，没有实行文化专制，而是以隋为鉴，求言纳谏，广开才路，广开言路。这对一代文章的发展，影响不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首先产生了许多谏疏之文。魏徵等人的谏疏，如《谏太宗十思疏》等，能够知无不言，披肝沥胆，在历代的政论文章里独具特点。

但是，唐朝的统治，也如历朝历代，开国之君，比较开明，而继世之主，便走向反面。到了高宗之时，就不再求言纳谏了。在这个时期，便产生了王勃等初唐“四杰”之文。这几个人的文章特点，形式上继承了南朝的骈体，内容则多是怀才不遇的牢骚。骆宾王之写《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和他个人怀才不遇很有关系。这些作者在唐初开明政治的启迪之后，往往幻想建功立业，而一旦失意，便不免满腹牢骚。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之所以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是无缘无故的。

到了天宝年间，唐朝的统治逐渐衰微，“安史之乱”前后，文章又有变化。这

时的许多作者，目击时艰，写出了许多忧时念乱之文。这类文章的代表作者是元结。此人虽然不曾倡言“古文”，却是“古文运动”的先行者。

到了贞元以后，朝政日益腐败。一些文人学者大都不满现实，希望有所变革。这时韩愈写了许多文章，大讲广开才路。《毛颖传》一文，表面看来，似是游戏笔墨，其实是讽喻人才不尽其用。这样的文章，和他的《原毁》、《进学解》等，一脉相承。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直接参加者，志在解救生民，为文尤有时代特点。他的《永州八记》，貌似模山范水，实为骚体之文。与韩、柳同时的很多作者，如李翱、刘禹锡等，也都写了一些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直到此后的孙樵、杜牧，仍受此风影响。后世所称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和当时的朝政改革相辅而行的。

到了晚唐，朝政改革彻底失败。藩镇跋扈，宦官擅权，在黄巢起义前后，文章又有变化。这时“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杂文小品是这个时期最有时代特色的文章。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同上）皮日休后来是参加了黄巢起义的，这也恰是他“并没有忘记天下”的证明。

经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初，统治者亦甚开明，从太祖开始，广开才路，广开言路，比唐代又进一步。因此，有宋一代，涌现了更多的关心现实、志在改革的人物，其中多半也都是“古文运动”中的作者。从王禹偁开始，为文指摘官多吏冗，切中时弊。范仲淹执政，“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为文，都为世人崇仰。欧阳修主盟文坛，选拔苏轼父子等众多作者，对于一代文章的发展，起了更大的作用。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自然，明白晓畅，形成了北宋之文的典型文风，对此后几代都有影响。在欧阳修以后，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者是苏轼。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得之自然，自谓“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达到了挥洒自如的极高境界。他和欧阳修一起，代表了北宋文章的最高成就。

到了南宋，许多文人学者面临国破家亡的境遇，于是更多地干预朝政，论政之文蔚然而兴。早期的李纲、宗泽和胡铨，晚期的辛弃疾、陈亮等，都写了出色的论政文章。诗人陆游、理学家朱熹等也都有论政之作。

到南宋末，抗战救亡，又有文天祥、谢翱等作者，写出了悲壮慷慨之作。还有宋元之际的邓牧，所撰《君道》、《吏道》，上继魏晋文章的思想传统，与唐宋古文的传统不同，又有新的特征。

金元之文，上承唐宋。元时王恽称赞金之刘祁有云：“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道出了这两代文章的共同特征，即：思想接受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而文辞则接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从元好问到刘因，从思想到文风，亦一脉相承。

明代的开国之君，不同于唐宋两代。大兴党狱，文章颇受影响。早期的作者宋濂和刘基，都生活于元明易代之际。两人都是开国功臣，都以文章著称。但二人之

文，写于元末者，很有生气，写于明初者，则多歌功颂德之作。这类文章发展下去，便出现了“台阁体”。

到了明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都主张文章复古，反对台阁时文，由于主张比较片面，创作实绩也并不高，故时人多所訾议。但其中有的作者，指陈时弊，也写过一些出色的作品。例如何景明和宗臣所作，也都有特色。

当前、后“七子”提倡文章复古之际，又有唐顺之、归有光等人主张宗法唐宋。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归有光。他的文章，自然平易，言情叙事，哀婉动人。几篇怀旧之文，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都写得有声有色，笔墨淋漓。另有一些论政之文，虽然不甚为人注意，也都很有时代特色。

但最能代表明代文章新的时代特点的，还不是归有光等人的作品，而是“公安”、“竟陵”的小品文章。公安“三袁”，都受李贽影响，其为文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撰书札、游记、随笔之类，都很新颖。其中有闲情逸致，也有愤激不平。袁中郎的成就，尤为世人称道。

到了明末，复社、几社的文人学者，目击时艰，多所感愤。他们又不满当代小品之潇洒自适，便属意于恢复古学。文风至此又有变化。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内容、格调都与抒写“性灵”的小品不同了。

明清之际，又值改朝换代之时。此时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三人之学，都讲经世致用，为文语尚征实。顾炎武倡言“不作无益之文”，考古证今，文风由此一变。

但清初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超过了历朝历代。文字狱之兴，对文章的发展影响至巨。早时的唐甄，尚能写出《潜书》一类著作，但经过几次文字狱后，言路日窄，方苞、姚鼐等“桐城派”的作家，便只能“助流政教”、倡言“义法”了。方苞为人为文，曾用两句概括：“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话不全准确，但就大体而言，却正概括了“桐城派”文章的基本特点。当然，这也只就大体而言，对于方苞、姚鼐之文，也要具体分析。而且有清二百几十年间，文章也非桐城的一统天下。尤其是到了清之末叶，龚自珍等人为文，一反桐城“义法”，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所创新。再到后来，章炳麟之写《〈革命军〉序》、梁启超之写《少年中国说》，文章更崭新一新了。梁启超的“新文体”且曾风行一时。但这样的文章，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仍是过渡的产物。文章更大的变革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但这已非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了。

绪论至此，要补充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代文章的发展变迁，二是关于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

关于历代文章的发展变迁，我曾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两句，以为可代弁言。此外，近代学人有些言论亦可参看。例如梁启超论述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时，曾将从先秦到晚清的若干朝代，划分为七个时代。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

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饮冰室文集》之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今天看来，学术思想之变迁，不尽同于文章之变迁，但文章之变迁，亦与学术思想之变迁有所关联。

梁氏之后，论文章变迁而联系到思想变迁者，还有刘师培的论文之说。他说：

……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汉之文，无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国之文，若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作，咸多审正名法之言，与西汉殊。）六朝之士，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如葛洪、孙兴公、王逸少、支遁、陶渊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达为高。齐、梁之文亦然。）隋、唐以来，以诗赋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说家言。（观《唐代丛书》可见矣。）宋代之儒，以讲学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抱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笺注训诂之学，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举说经之文言之。）虽集部之书，不克与子书齐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子者，是亦区别学术之一助也。（《论文杂记》十二）

关于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前人更多论述。其中关于韵语骈句的论述，尤为突出。清代早期的学人持此论者有顾炎武。他说：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两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

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醑在户。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睟睟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有不用韵者。（《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中多有韵》）

顾氏之后，持此论者有阮元的《文言说》。他说：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至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悟，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

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

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名曰“文”，且尊之曰“古”也！（《研经室三集》卷二）

阮氏之后，持此论者，还有康有为。康氏在《教学通义·言语第二十九》中说：

……盖古之为文，使人易诵，故《易》、《诗》、《礼》辞皆多韵语。孔子之为《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又曰：“云从龙，风从虎。水流湿，火就燥，圣人作，万物睹。”皆韵语短句。《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尧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曲礼》曰：“俨若思，安定